

>>>本期关键词:高校感受



图片来源: http://www.chilliwacktoday.ca/?p=8616

文章的水平,研究经费也是一大因素,其评审系统如NIH的水平非常高,我的学院有许多失去外边经费的教授转而申请院内经费,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临床的空间则完全由自身的能力决定。我选择的专科并不赚钱,由于与患者和社会直接打交道,要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具备超强的社会交流能力,对北美的家庭、伦理、社会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这对一个他国文化语言成长的人有先天的障碍,相对于教职来说有天壤之别。受益于特殊的交流训练,我的社会能力要远超过本土出身的基础医学教授,如我的同事,能够指导社会专家(Social Worker)的交流沟通工作,对社会全方面的视野,我能体会那些有抱负的华人教授的玻璃天花板的感受,他们和我接触过的政客相比,用中式英语可描述为“too simple, too naive, too soft”(太简单,太天真,太温柔),海归由国家提供的政治平台和海外自我打拼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临床的信誉在于同行和同事心中的评价和无形的信任,与学历头衔关系不大,在以前的医疗系统,我曾受到过许多团队的邀请加盟。临床工作的收获是每一份汗水的结晶,我从来不做慈善工作和免费义务医疗,回报于社区的是义务兼任医疗部主任,指导一家有上千户家庭的跨州医疗服务公司,我不取分文工资。按照现在的水平,一个月两个整天的工作相当于一个高年资的副教授,4个整天相当于一个讲席正教授。社会地位也是令人向往的。举两个例子,一次为病人出庭听证,检察官交谈一个多小时,法官亲自见面打招呼,有北美经历的都知道,法官的尊严是轻易不动大驾的。另一次应邀出席一个学区的运动会,组织人引见学区总监介绍说这是我的病人,后面的人起立行注目礼,那种感觉就不描述了。

作为科学的网站,介绍的都是在海外成功的科研学术人士,他们让人敬仰但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有能力和机遇的双重因素。在北美拿到博士的未必一定能拿到教职,拿到教职的未必拿到终身位置,而即便拿到终身教职的也不敢保证永远有经费,我见到过许多杰出教授、学会成员因失去经费走人的。国内挣个国际声望就能享受数以亿计的经费,这种资源最终会被浪费掏空的。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像华尔街的金融巨鳄那样来得太容易是迟早要出事的。

在此与博友分享一些经历,是想说有实力和能力是可以过不同的平台达到理想的境界,科研学术不过是一种平台罢了,国内应该提供不同的平台让贫寒和富家子弟有公平施展的空间,知识改变命运不应该只有学术一条路。

(http://blog.sciencenet.cn/u/yw20002000)

说说大学的教职和专业兼职

吴云鹏

前一段时间,一位毕业于名校MBA现经商的朋友来访,聊天时大谈在美国挣钱难,一份收获一份汗水,没有免费的午餐,相比国内能轻松挣钱,做销售的打打电话就能挣个三四十万,在美国计划一个商业项目要花很大脑力也不一定成功。

收到系里的年度评估让我脊背发凉了一下,总结了优点和需要改进之处,指出的不足之处基本准确到位,看来系里是开会讨论过的。临床教授与TENURE(终身职位)不同的是必须维持医生资格,类似的是定期作一次考评。我大概是晋升最快的教授之一。

我选择现职位的原因是既有学术的兴趣同时也有临床的自由发展空间,实际相当于两个职位即教授加临床医生。

北美的临床教职有两种类型,一种研究型,有经费、团队、实验室等,他们有医生资格但完全从事研究工作,工资相当于全职的临床医生。

另一种临床型,临床的能力和收入的差别是很大的,东海岸那家医学院有两位教授是各专科协会的主席,其中一位的收入达7位数,他们都不拿医学院的工资但有实验团队也出文章,经费的来源是多样化的。

北美大学教职都是定期考评的,不分年资职位高低。和退休的老教授交谈过,他们都收到一样的考评。我担任研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主要评估院内的科研经费申请,由于临床工作繁忙几次未能到会,考评时受到严肃的质询,拿一份工资要出一份力,必须严肃认真,马虎不得。

北美的临床工作是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最高的职业之一,教育和训练的水平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由一批真正的医学教育家在一线推动,医学教育的规范也不断改进。国内也在搞住院医师的规范化训练,老的训练模式早已退化过时,学习北美新的规范和模式,这不是派几个人短期访问、领导写几本书出一个大纲能解决的,其深层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精神,不可能通过纸上谈兵来实现。北美的临床训练其职业性水平如同“功夫绝技”金钟罩铁布衫的锻炼,用铁锤从头顶砸到脚,对于“弱势”进行专门性的训练,其过程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我因此坐了6个月的“语言交流”监。不优秀即淘汰,有一位国内顶级军队医院的高年资主治医师第一年便离开了,一位中东的高年资医生只坚持了6个月便淘汰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回国挂的都是医学博士和医学院教授的头衔,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从Professional(专业的)的角度看连学前水平都达不到,这是基础医学同事留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教了多年的医学课程。

如果教职归医学院管的话,临床工作是由自己完全支配主导。我有两边的账户,教职的账户由系秘书负责,临床的账户由一个专业团队来管理,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像国内那样的不明挪用是绝无可能的。北美教职的研究工作除了

解决的,其深层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精神,不可能通过纸上谈兵来实现。北美的临床训练其职业性水平如同“功夫绝技”金钟罩铁布衫的锻炼,用铁锤从头顶砸到脚,对于“弱势”进行专门性的训练,其过程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我因此坐了6个月的“语言交流”监。不优秀即淘汰,有一位国内顶级军队医院的高年资主治医师第一年便离开了,一位中东的高年资医生只坚持了6个月便淘汰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回国挂的都是医学博士和医学院教授的头衔,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从Professional(专业的)的角度看连学前水平都达不到,这是基础医学同事留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教了多年的医学课程。

大学校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想想如何限制大学行政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制定相关制度,培育相应文化

大学校长职业化起航:无奈的选择

刘广明

前段时间,中国大学出了两位“新星”校长。一是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他在去年10月宣布,在校长任期内,将做到“两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项目;第二,不新带研究生!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他在今年7月上任后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将做到“四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项目;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

对此举,赞扬者有之,但反对者也不少。赞扬者的理由很多,但反对者的理由也不少。“‘985’大学,校长不带头搞科研,怎么能这样?”“不搞业务的校长会是好校长?”但我认为,大学校长的“两个不”或“四个不”,代表着中国大学职业化的开始,这也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一种无奈选择。

大学校长,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毫无疑问应该做科研,教学生,甚至为本科生上课。这在国际上也是惯例,国际上知名大学校长完

全做到“两个不”或“四个不”的并不多。目前见之报端的更多的是耶鲁的莱文,他在任内没有带研究生,只出了一本书,叫《大学工作》。德国一些大学也规定大学校长任内不得进行教学与科研。行政权力大于一切,官大学问大。只要查下中国大学现任领导的业绩,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业绩卓著”!有些在任内发表了一堆论文、一批著作,获得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奖励,甚至获得院士称号。而问题是,中国大学领导根本没有时间作研究。即便是没有宣布“两个不”、“四个不”的校长,其在教学和科研上用的工夫也是少得可怜。同样,这是中国大学官僚化的一个怪胎。

这里面的问题是大学的行政化在作怪。在目前的中国,大学行政权力无边界、无限制、无节制。行政权力大于一切,官大学问大。只要查下中国大学现任领导的业绩,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业绩卓著”!有些在任内发表了一堆论文、一批著作,获得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奖励,甚至获得院士称号。而问题是,中国大学领导根本没有时间作研究。即便是没有宣布“两个不”、“四个不”的校长,其在教学和科研上用的工夫也是少得可怜。同样,这是中国大学官僚化的一个怪胎。

中国大学校长,书记有开不完的会、应付不完的饭局、应接不暇的评估与检查,他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做科研呢?其成果,无疑是其官员身份带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反对大学领导者兼做教学与科研工作,与教师抢资源。所以当出现大学校长宣布“两个不”和“四个不”时,人们普遍持欢迎态度,把他们当成大学英雄。

但问题是,这能治本吗?一个校长可以自我约束,其他行政权力可以得到约束吗?大学校长没有了学术性工作,其精力会不会更多地放在“公关”和“协调”上?如果全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均上行下效,大学科研还有谁来引领?

我从来反对大学校长职业化,而且积极主张大学校长职业化。因为,随着大学进入社会的核心位置,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国,更是如此。社会迫切需要大学对社会作出积极的应对,大学应该引领社会,引领企业,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方面。与此相伴的是,

随着大学与社会的紧密程度的提高,大学与社会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也就越来越多,大学不得不由专业人士来管理,来带领,来协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主张,当今的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企业家、管理者、教育家的集合体,大学校长更多地应该把精力放在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上,放在资金筹集和人才引进上,而不是放在教学与科研上。

但我要说的是,大学校长承诺“两个不”、“四个不”标志着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开始,但这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行动。中国大学的发展,更需要的是一种大学求真的文化与环境。大学校长仅仅承诺“两不”或“四不”是不够的,大学校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想想如何限制大学行政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制定相关制度,培育相应文化,为大学创造学术至上、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环境与氛围。

(http://blog.sciencenet.cn/u/qmxl)

原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教授”被当下部分社会大众称为“叫兽”,究竟是谁的悲哀?

教授的悲哀

刘庆生

曾看到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认为社会上将“教授”称为“叫兽”是教育的悲哀。是啊,堂堂大学教授本应是社会精英,至少也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而今,竟然被部分社会大众冠以动物名称。尽管人也是属于动物门类,而且人类属于“高等动物”。由于“兽”尤其是野兽,经常与“畜牲”并列而提,因此,无论如何,将教授称为“叫兽”的社会现象让我等教授们何等斯文扫地,脸面丢尽。那么“叫兽”称谓是教育的悲哀吗?是社会的悲哀吗?或揣测,特“叫兽”称谓是教育悲哀的观点似乎是责怪称呼“叫兽”的人。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称呼教授,因为“叫兽”毕竟是一个非常不雅和丑陋的称谓。况且称呼者们通常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

想当年,大学教授是何等风光。即使在知识阶层,为了突出“教授”的“高贵”和“尊严”,领导们赋予一些匪夷所思的称谓,如教授级研究员(我认为是最无厘头的称谓)、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那么,原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教授”被当下部分社会大众称为“叫兽”,究竟是谁的悲哀?我认为主要是教授的悲哀。

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1965年我上大学时,我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共有正副教授23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现在中

国地质大学南、北加起来可能超千人,是原来的约40倍。那时教授和副教授都在海外名校留学归来或国内名校毕业(主要是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且成果等身。要晋升副教授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彭志忠老师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首次测定复杂葡萄酒晶体结构,破格晋升副教授。“文革”中他被下放到我湖北黄冈丹江口五七地质队。那里条件很差,我看到他那阴暗潮湿房间的书架上大量以俄文和英文为主的外文书籍非常感动,也影响我至今。对这些教授我一直仰视和羡慕不已。那时教授在我心目中就是一群“学问高深道德高尚”的人,并暗下决心,将来也要争取成为一名这样货真价实的教授。

那么教授悲哀的根子在哪儿呢?我以为主要在下面三点: 1.政府主管部门管理缺失,对教授职称晋升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监管。据我所知,除了美国少数名校的正教授的比例稍高外,一般大学的比例不高,尤其是以前的英联邦系统大学。我2002年初在香港大学学术访问时,地球科学系只有一个正教授岗位,只有这个教授离开,才可能晋升后来者。近些年香港大学向美国大学学习,正教授岗位增加了好几个。据我所知,现在教育部

直属高校,政府部门都赋予正教授的评审权。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指导意见,但实际操作并没有那样规范。由于管理缺位,导致教授评审泛滥,即使某些名校也不例外。尤其是部分长期不做科学研究的管理干部也头顶教授头衔,招摇过市,严重影响了教授的社会声誉。

2.社会盲目崇拜,尤其是某些媒体不恰当的渲染。尽管现在不少人反对教授似乎不屑一顾(武汉市珞瑜路两边高校多,市民调侃珞瑜路上教授满街跑),但是倒退若干年,教授还是很吃香,否则管理干部们不会趋之若鹜,导致教授数量大增,质量大打折扣。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博士生导师(只是一个指导研究的资格)、政府津贴获得者(一种荣誉待遇)、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待遇)、院士(学术荣誉)等渲染。现在“与时俱进”的头衔更多,如中组部“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杰青(今年开始又有“优青”)、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头衔,真让人应接不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这些头衔放在个人简介中无可厚非。因为,其中部分头衔真实反映个人奋斗历程,而且多数也是名副其实。然而作为媒体报道技术身份时只需规范的职称头衔: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或学位称谓博士,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始终认为,社会分工不同,各种称

谓不同是很自然的。

3.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教授自身。在早期的教授评定中资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还有部分教授在晋升时由于种种原因,其实际条件大打折扣。部分教授严重缺乏自律,当上教授后学术上不求上进。有的人责任当下的环境不好,导致部分教授不思进取,对此我完全赞同。试想“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陈景润还可以潜心钻研,出大成果。即使我这样的大学生还在“文革”中闲中取静,学会装半导体收音机,并开始自学英语(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学习俄语),何况今日,即使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在我周围仍然看见不少人(包括年轻人)为科学研究勤奋努力、洁身自好。我的学校也有意识保护了一批这样专心学问者,没有让他们担任实质性行政职务。让他们专心做科学研究,出高水平成果,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我自己也经常对那些来办公室聊天的青年教师坦露心扉,叫他们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环境、不怨体制,只怨自己浮躁,只怨自己坐不了冷板凳。试想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人成果等身,有的人成果鲜见。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社会,私利私欲人皆有之,不侵害他人就行。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六十分的意义

我的教学日记

葛素红

记得我们还在上高一时,中学生语文报上发起了“60分万岁”的讨论。但凡做学生的、以分数为基准线的,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记得当初我是明确支持“非100分万岁”的,而我们另外一位同学坚决支持“100分万岁”,她因为凡事都要做得优美而获得好评,当然,她不负自己的努力,是我们当中及早成功的典范。而其他的伙伴,我至今还能记得她们语焉不详、首鼠两端、支吾其词的样子。的确,不用怀疑,我的“非100分万岁”的哲学,把自己弄得起起落落,成其为平庸之徒的

落好好坏坏莫衷一是,成其为平庸之徒的

五色人生。 也不是没有理由,我总觉得凡事尽善尽美总是有些过分,或者说,这世上不会有尽善尽美的事情,无论大家怎么努力。所以,我坚持认为60分万岁也有其可爱之处。但是,这个问题在我人生的中年再次遇到。儿子上小学时,我没有要求过他考神马变态分数的“双百”,不知道是哪根筋有问题,我总觉得一个男孩子细心到一点错误不犯一个错字不写,真有些不符合人性的基本。好在他遇到的小学老师都和我一样粗放,也是有惊无险地过来了。现在中学的课程难度、广度、深度都大大地增加,全年第一满分也不多,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实施“非100”战略。

但是,问题却恰恰出在了“我的大学”。这一次期末考试,学校各个学院对老师都有一个一致的要求:“题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保证过关率。”这样一个明确的要求使我的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强烈地增加了。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般考题都不是由年轻人出,就是年轻人出,也要一个老教师把关。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我才明白——就是因为对于题目的难易程度把握不够,关键是怕出得太难了。十来年了,我应该在把握题目的难易程度上有些经验了吧,是不是过关率会增大?这个感受说实在的真没有。感受最深刻的是,我对自己讲的课越来越明晰,讲解也可以说能够旁征博引比较透彻了,教室里那些涣散的偶尔看着我迷茫一下的眼神却从来没有减少,有时候还有增加的样子。

我知道,物理这个学科不能不说很难学,不下功夫他们学不会,没有连贯的学习,他们听不懂。可是,要求我提高教学能力来改变这种现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1996年就有学生在课间问我他们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无言以对,因为没有教他们九阴白骨爪,我只是教他们强身健体提高素质打基础,他们没有能力透过我的悠远的目光看见光明,他们需要一毕业就能一叠叠来钱的那种课程或者什么东西。而我,我也不知道那种东东目前在全世界的教育界孕育了没有。

任何时候学生总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认真学习坚持成就自己的,占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不到。第二类是起落不定的摇摆型,好好学习,认真热情,但是,外界有一点扰动都会改变他的方向,让他摇摆起来,有时候会恢复,有时候就偏离远了。这三类学生,占到一半。第三类,就是很很很干脆不学习的,接受种种诱惑,五花八门,上课时心不在焉频频白眼或者昏昏欲睡的,就是这类人。

而分数和考试,实质上只对第一类人有切实的本来意义,那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理解掌握了没有。然而,我们出的试题,却不是针对这一类学生的,我们要着重考虑到第二类学生,尽量让他们及格,甚至至于我们希望第三类学生及格。当然,装死的人是不叫醒的,第三类人任凭出卷老师怎么努力都很难及格。为什么,我们老师出个试卷这么难?因为在第二类学生和第三类学生的眼里,60分是他们的毕业证,而不是目前的课程掌握程度。

于是,60分分化、堕落、庸俗。60分在第一类学生眼里是失败和耻辱。在第二类学生眼里是交差、运气、谢天谢地。在第三类学生眼里是神话、关系和照顾。而当我们从来不求100分的时候,60分在我们老师眼里是心痛,是心血的流逝,是生命的浪费。

(http://blog.sciencenet.cn/u/cyaninelotus)